

“新东北作家群”的沈阳故事与 沈阳城市文化形象建构

周璇 谢忆梅

沈阳大学 文法学院, 中国·辽宁 沈阳 110044

【摘要】近年来,备受关注的“新东北作家群”三位沈阳籍青年作家,以其文学自觉和文化自觉书写沈阳故事,并显示出了对沈阳城市文化形象建构重要价值。这种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其由印刷媒介向影视媒介、数字化口语媒介拓展的跨媒介传播形态,二是与其网络媒介积极互动并融入“东北文艺复兴”的大众文化建构路径,前者扩大了这些故事承载的沈阳城市文化形象的传播范围,后者则以去蔽和还原的方式实现了对沈阳城市文化形象的更新与重构。

【关键词】“新东北作家群”; 沈阳故事; 沈阳城市文化形象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3年度沈阳市社会科学立项课题“城市美学视域下的沈阳城市文化建设对策研究”(SYSK2023-01-146)研究成果。

引言

城市是物质载体与人文精神的复合体。在作为现代化重要面向的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的物质形态往往呈现出趋同的演化倾向,并集中表现为相似的现代化建筑与公共设施。与之相比,各个城市的人文精神却是多种多样的,也因此得以更多地参与一座城市文化形象的建构,并使城市文化形象呈现出个性化的独特魅力。在诸多人文要素中,文学的人文气质无疑是浓郁的,因为正如高尔基所说,“文学是人学”。刘禹锡的乌衣巷、杜牧的秦淮河之于南京,李白的烟花三月、姜夔的二十四桥之于扬州……这些文学片段凝聚着一代又一代人关于这些城市的文化记忆。作为“人学”的文学,一旦以某一城市为背景和文化土壤,就会天然地融入这座城市的人文精神,成为该城市文化形象的有机载体。比如20世纪30年代的京派文学与海派文学,前者彰显了北京的厚重气质,重视对文学传统的继承,后者则与上海的开放精神相应和,形成了多元开放的风格。

但同时,文学又不仅仅是在被动地承载所在城市的人文气息,而是会主动从城市的人文精神母体中萃取最精华的部分,凝聚为具有超越性的文学之魂,再反过来生长为参与建构该城市文化形象的重要精神资源。正如没有杜甫躲避乱世,在蜀地结庐,并留下无数经典诗篇,很难想象成都都会成为今天的“文艺之都”,同样,如果没有鲁迅对故乡的动人书写,绍兴这座文化名城的魅力也会大打折扣。

进入当代文学阶段,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进一步加速,文学继续扮演着建构城市文化形象的重要角色。比如,苏州的当代文化形象,就是在陆文夫《美食家》中描

绘的饮食习俗、苏童在“香椿树街”上叙述的市井生活中,变得更加鲜活和生动的。新世纪以来,沈阳成为文学世界中最引人注目的城市之一,而集中讲述沈阳故事的,则是近年来被视为“东北文艺复兴”重要力量的“新东北作家群”,这些故事也由此成为沈阳城市文化形象建构的重要资源。

1 新东北作家群书写沈阳故事的文学自觉与文化自觉

2020年,学者黄平以“新东北作家群”概指近年来活跃于文坛的双雪涛、班宇、郑执等青年东北作家^[1]。不同于1930年代步入文坛的“东北作家群”,其成员来自东北各地,“新东北作家群”的三位作家均来自沈阳这座城市,生于80年代的沈阳市铁西区,也被称为“铁西三剑客”。因此,尽管被归属为“新东北作家群”,但他们笔下的东北故事,其实主要是沈阳故事。

在空间上,“新东北作家群”明确地以沈阳为空间背景,讲述这座工业城市里发生的故事,如双雪涛《平原上的摩西》《我的朋友安德烈》《北方化为乌有》,班宇的《冬泳》《逍遥游》《工人村》,郑执的《生吞》《仙症》等小说。这些作品,不同于苏童,以苏州齐门外大街为原型,塑造了文学地名“香椿树街”,而是在真实的沈阳城市空间中展开叙事。其中的代表包括双雪涛笔下的艳粉街、红旗广场,班宇笔下的工人村、工人文化宫,以及郑执笔下的大西菜行等。总体而言,这些故事的地理中心是最能表征沈阳作为工业城市身份的铁西区,地处铁西区的艳粉街和工人村是这个工业区中工人聚集的代表性生活区。也就是说,这几位作家书写的,正如他们的另一个称号“铁西三剑客”所表述的,是地域色彩鲜明而纯正的沈

阳城市故事。

在时间上,“新东北作家群”将视角拉回上个世纪90年代,从生于80年代并在此时处于少年阶段的“子一代”视角,讲述那个国企改革时代发生在父辈身上或父子两代人之间的沈阳人的故事。双雪涛《大师》中的“我”、班宇《逍遥游》中“我”(罹患重病的少女许玲玲)、郑执《生吞》中的“我”(少年王頔)等,都有身为工人的父亲从工厂下岗,并因此被迫改变少年时代生活轨迹的困苦经历,这些经历一方面为这些故事刻上了老工业基地沈阳遭遇时代阵痛阶段的文化烙印,另一方面,也使它们更容易在城市共同体内部唤起集体记忆与情感共鸣。

在语言上,擅长使用现代主义手法的“新东北作家群”作家,并没有使用带有翻译腔的长句和书面语,而是以沈阳地域特色浓郁的口语和短句为主,令作品散发出沈阳这座城市独有的人文风味——生动、热烈。比如用“犯不上”表达不值得(双雪涛《平原上的摩西》);把“一盖帘儿”用做速冻饺子的数量单位(双雪涛《北方化作乌有》);用“拉脚儿”指代人力车拉货生意,用“别扯了”表达对方的不赞同(班宇《肃杀》);把小儿子叫做“老小儿”,把秦阿姨称为“我秦姨”,以“多少年了都”的倒装形式表达强调和感叹(班宇《工人村》);用“嘴瓢了”描述口误状态,用“掏钱”代替“付钱”(郑执《仙症》);把做生意表述为“做买卖”,以“赚死工资”的“死”来形容工资固定的程度(郑执《生吞》)……

事实上,这些从内容到形式都显示出鲜明地域色彩的作品设置在沈阳,并非单纯因为作家成长于此,正相反,它是出于几位青年作家的文学自觉的有意为之的结果。2017年,双雪涛在谈及《平原上的摩西》的创作动机时,就展现了这种文学自觉,“这个小说另一个源头是我在北京看了一部电影,讲的是东北发生的罪案,我是沈阳人,我也想来写一个,跨度更大,更绕一些,为那些被侮辱被损害的故乡人留一点虚构的记录”^[2]。当时,生活在北京的双雪涛,正是抱着为故乡沈阳留下记录的想法,创作了这部小说。不仅如此,在书写沈阳故事的文学自觉背后,还潜藏着将文学之根深植于城市,并以之反哺城市人文的文化意识,即以沈阳文学建构沈阳文化的文化自觉。班宇2018年创作的《未来文学语言》中,以半戏谑半严肃的口吻,描绘的他眼中关于新东北作家群与沈阳这座城市未来文化图景:

2035年,80后东北作家群体将成为我国文学批评界的重要研究对象,相关学者教授层出不穷,成绩斐然。与此同时,

沈阳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命名为文学之都,东北振兴,从文学开始。

“文学之都”荣誉称号始于2014年,是由联合国向入选“创意城市网络”的城市授予七大主题荣誉称号之一,爱丁堡、都柏林、海德堡等文学名城位列其中,2019年南京市更是成为中国第一个文学之都。班宇对沈阳成为文学之都的畅想,并非身为“新东北作家群”一员的自我调侃,而是一种真诚的文化展望,即通过他们对沈阳的文学书写,使沈阳成为以沈阳文学著名的文学城市,再从人文的角度入手,以文学建构沈阳文化,实现沈阳振兴,乃至东北振兴。正是基于这样的文学和文化自觉,“新东北作家群”的沈阳故事,理应被视为沈阳城市文化形象建构不容忽视的人文要素与文化资源。

2 “新东北作家群”沈阳故事对沈阳城市文化形象的跨媒介传播

从媒介形态上,“新东北作家群”的沈阳故事没有依赖单一的印刷媒介,而呈现出了向影视媒介和口语媒介拓展的跨媒介传播特征。这种兼顾印刷媒介、网络媒介、影视媒介的多形态跨媒介传播,使这些作品的影响范围变得更大,其接受群体远大于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受众,作品所讲述的沈阳故事因此流传得更广,更能在沈阳城市文化形象建构中发挥其影响力。几位作家的沈阳故事传播或多或少地显示出了跨媒介特征。

首先是这些作品的影视化传播。上个世纪80年代末开始,我国的大众文化兴起,并以其影视媒介为主的文化形态冲击和挤压着印刷媒介文学的生态。进入新世纪,这一态势得到了延续,相较于文学读者,影视作品的观众数量更多,这也意味着文学作品经由影视改编后,其故事的传播范围也会变得更广。2021年,双雪涛的《平原上的摩西》被改编为电影《平原上的火焰》,2023年又被改编为6集的电视剧《平原上的摩西》。郑执《生吞》也在2023年被改编成了16集电视剧《胆小鬼》。班宇的《冬泳》也已售出版权,进入了影视改编的筹备阶段。2024年1月,在豆瓣网站上,双雪涛的《平原上的摩西》,分别由三个出版社出版,累计评论共计54000余条,而同名电视剧的评论则超过75000条。郑执简体繁体两个版本的小说《生吞》,书籍评论共计近60000条,而同名电影的评论则超过78000条。这些数据直观地展示了这些故事借助影视媒介扩大影响的状况。这些作品实现影视化跨媒介传播后,还会反哺文学作品本身的接受和传播,如在知识问答网络平台知乎上,名为“如何评价双雪涛的小说《平原上的摩西》”的问题下,几个回答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同名电影的影响。

其次,是这些作品的口语媒介形态转化与传播。口语媒介是最早的文学媒介,但在文字和印刷术诞生后,其地位逐渐被手抄媒介和印刷媒介取代,直到上个世纪末,大众文化进入网络数字媒介阶段后,口语媒介才在化为数字化形态后得到了复兴,并发展为印刷文学的跨媒介传播形态之一。在喜马拉雅、懒人听书、蜻蜓FM等平台上,双雪涛的《平原上的摩西》《飞行家》,班宇的《冬泳》《逍遥游》,郑执的《生吞》被制作成有声书或有声读物,并以其更为便捷的收听场景和媒介传播特征,进一步扩大了这些作品的接受范围。例如,在听书平台喜马拉雅上,在班宇的小说集《冬泳》制作成的同名有声书专辑中,最受欢迎的前三名累计播放量已超过了大约32万。

正是印刷媒介向影视媒介、数字化口语媒介的转化和拓展,使“新东北作家群”的沈阳故事具备了上个世纪作家笔下沈阳故事无法比拟的跨媒介传播优势,进而在传播中,持续建构其所承载的沈阳城市文化形象。

3 “新东北作家群”沈阳故事对沈阳城市文化形象的大众文化建构

从文化建构路径上看,“新东北作家群”的沈阳故事的广泛流传是文学与大众文化积极互动的产物。“新东北作家群”沈阳故事的广泛影响力得益于网络媒介与大众文化“东北文艺复兴”热潮的加持,它们之间的密切联系也为作品所承载的沈阳城市文化形象提供了一条有效的大众文化建构之路。

东北作家群创作的沈阳故事的广泛传播,是与大众文化及其网络媒介载体的影响分不开的。郑执成名于2018年,他的短篇小说《仙症》获得了当年的“鲤·匿名作家计划”首奖,而这一计划和匿名评选模式的灵感则来自大众文化领域,是受到音乐真人秀节目“蒙面歌王”的启发的结果。早在正式成名于文坛前的2014年,班宇就在豆瓣网站签约“豆瓣阅读”计划,连载了广受欢迎“东北疯食录”专栏系列作品,两年后又发表了《打你总在下雨天:工人村蓝调故事集》,并获第四届豆瓣阅读征文大赛首奖,故事集中这4部短篇小说,后来被收录在他的代表文集《冬泳》中。直到被正式纳入“新东北作家群”之前,网上班宇的身份介绍中还有“豆瓣小说博主”的标签。并且,真正使班宇被大众熟悉的,也并非2018年主流文学期刊《收获》发表了他的《逍遥游》,而是2019年偶像明星易烱千玺、电影导演贾樟柯、歌手李健等在社交媒体中对《冬泳》的认可或赞美。双雪涛正式进入文坛的标志是2011年、2012年先后获得了台湾省的两次文学奖项,但他作为

新东北作家而广受关注,则是在2019年的大众文化热潮“东北文艺复兴”现象之后。

2019年,在说唱歌手董宝石在脱口秀真人秀节目中调侃式的喊出“东北文艺复兴”后,这一口号迅速在网络媒介中流传开来,成为大众文化的热点话题之一。事实上,在同一年更早的网络媒体访谈中,和班宇同时受访的董宝石就已经提出过这个口号,并因此与班宇并称“文艺复兴双杰”。后来,随着更被大众熟知的网络视频创作者老四、脱口秀演员李雪琴等也被纳入“东北文艺复兴”阵营,这一名词在大众文化中成为热潮,并受到学术关注,双雪涛、班宇、郑执作为“新东北作家群”也因此被整体纳入“东北文艺复兴”这一大众文化议题,又被称为“东北文艺复兴三杰”,并作为该文化现象的典型代表而被大众所熟悉。

对于新世纪文学来说,限于接受和传播的历程较短,缺少经典化所需的漫长积累时间,从城市文化角度看,往往难以具备杜甫诗歌和鲁迅作品那样的城市文化形象建构效果。但从上述“新东北作家群”与大众文化积极互动的路径可以看出,“新东北作家群”及其讲述的沈阳故事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兼容与亲和关系,不但弥补了新生作品文化影响力不足的弱点,还开辟出了以城市故事建构城市文化形象的大众文化新路径。

沿着这条新路径,“新东北作家群”以他们讲述沈阳故事的文学与文化自觉,展现了这座城市曾经“落魄的表象下面”“不可让渡的尊严”,既是对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笼罩在沈阳乃至东北工业城市形象上的不公正的“新自由主义的霸权想象”的去蔽^[3],也是对真实沈阳形象的还原,对沈阳城市文化形象的更新与重构。当这一文化建构历程在大众文化中汇入“东北文艺复兴”之流,大众将“通过‘东北文艺复兴’重新理解东北……理解普通人的命运与尊严”^[4],那时,前文提到的班宇的愿景将成为现实——沈阳成为文学之都,以文学建构文化,从这里开始,以文化振兴东北。

参考文献:

- [1][3]黄平.“新东北作家群”论纲[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0(01):174,177.
- [2]双雪涛:写小说是为了证明自己不庸俗[N].北京青年报,2016-09-22(B05).
- [4]黄平东北·文艺·复兴——“东北文艺复兴”话语考辨[J].当代作家评论,2022(05):101.